

崇文学朮文库

说文学研究

「第二辑」

向光忠 主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综述近年来

《说文》学的研究状况，

评述传统语文学的

继承与发展，

汇集关于《说文》成书、篆籀辑录、

部首沿革、构字原理、

形义训解、音声考订、书体演变等

专题探讨的各种见地。

陈仿林学术研究 4



崇文学朮文库



向光忠 主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07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文学研究. 第二辑/向光忠主编. —武汉: 崇文书局, 2003
(崇文学术文库)

ISBN 7-5403-0687-4

I. 说… II. 向… III. 说文—文集
IV. H1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496 号

出版发行: 崇 文 书 局

(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 268 号 430070)

印 刷: 武汉市科利德印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中南路14号 4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插 页: 2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慎思创新 和而不同

- 第二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黎千驹(1)
- 王力先生对传统语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向光忠(13)
- 关于《说文》学的现代化研究 向光忠(33)
- 《说文解字》取资纬书说 舒 怀(43)
- 扬雄《方言》及其对《说文》的影响 顿嵩元 王云英(59)
- 从《说文》所收、《十三经》未见之字得到的启示
..... 施正宇 王绍新(71)
- 马王堆汉墓简帛中《说文》未收之秦汉字 张显成(82)
- 用系统论来重新审视《说文》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黎千驹(109)
- 《说文》解读与辞书释义 祝鸿熹(124)
- 《说文解字》研究刍议 宋均芬(133)
- 试论《说文》声训的解释形式 方 敏(138)
- 《说文通训定声》评议 杨 琳(148)
- 试论汉字演变的历史阶段 林 川(173)
- 释“扁书” 陆锡兴(186)
- 《说文》正篆性质研究评说 赵 铮(191)
- 试谈《说文》与“六书” 孙中运(204)
- 六书与汉字造字法之管见 张其昀(228)
- 六书和汉字构形 陈顺芝(243)
- 论亦声字,兼论形声会意的分野 黄翼斋(252)

从《说文》犬部字看犬与古代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 黄 青(259)

从《说文》“水部”看先民的洪水记忆 刘绪义(273)

《说文》声母:口——考析 何 添(287)

浅说声符的文化功能 冯宽平(301)

字素意义兼论 连登岗(313)

汉字形体增益 赵伯义(342)

从《说文》谈汉字使用的“并体兼义”现象 王英明(352)

汉字读音讹化寻源 孙中运(361)

汉字部首编纂法源流论正 肖惠兰(369)

论《玉篇》对《说文》部首的调整与改革 张 标(381)

论汉字部首的构成 陈 燕(403)

毫年学“眉寿”,切磋有长进

——问题好像出在《说文·六书》理论上 夏 淦(417)

《〈说文〉笺证》选录 陈秉新(425)

部首“彡”的解析 黎传绪(432)

释“告” 李恩江(441)

释亡、冂 张 儒(447)

说字六则 王铁琨(453)

论汉字的双本义 郝文华(472)

浅论叠体为文字和反向为文字在《说文解字》中的位置

..... 陈家宁(486)

学术简讯

第二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楚文化

故地——湖北荆门市召开 郑 肇(496)

慎思创新 和而不同

——第二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黎千驹

由南开大学和湖北大学主办、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荆门分院和湖北荆门外国语学校协办的“第二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6月28日至7月3日在湖北荆门召开。来自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收到论文70余篇，共有47位先生在分组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这些论文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亦不乏独到的学术见解，人们也可由此而窥见文字学研究的某些新的动向。研讨会采取分组讨论与大会典型发言相结合、个人发言与相互质疑相结合的方式，倡导“慎思、创新、民主、平等”的科学精神，因此研讨会上时常出现慷慨陈辞与质疑问难的生动场面。会议期间，代表们还饶有兴趣地赴荆门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随州博物馆考察古文物和古文字。现将本届学术研讨会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学术研讨概况

代表们主要就文字学研究、“说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与交流。现分别加以介绍。

（一）文字学研究及训诂与音韵研究

文字学研究涉及了甲骨文、金文与其他字义考释、简帛研究、字体与书体研究、汉字的性质、汉字的形体、结构与部首、现代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还有的涉及了训诂与音韵方面的内容。

关于甲骨文、金文与其他字义考释的如：夏渌的《耄年学“眉寿”，切磋有长进》，认为“眉寿”的“眉”本作“耄”，“眉寿”就是毛寿、老寿、长寿。在考证的过程中，该文还对六书理论是否符合汉字造字原理进行了反思。孙中运的《甲金文误释三例》，认为今人所释甲骨文中的“耜”字，实际上应释作“耕”字，认为今人所释金文中的“闢”字应释作“開”字，今人所释金文中的“𡩂”字应释作“废”字。陆忠发的《释几个利用空间关系表达概念的古文字》，考释了几个与宫城有关而又均为利用空间关系表达概念的古文字，如“廷”字，作者认为，清以来所释形、义均误，“廷”的本义是古代君臣处理政务的处所。认为“邑”之本义为“宫城”，相当于周代的都，而不是以前所解释的“城邑”义。过去认为“众”的本义为“奴隶”，该文认为“口”表示宫城，“众”字利用宫城外会聚的人群表达平民（与奴隶相对）的概念，所以“众”的本义为“平民”。金克中、周作菊的《释“去”》，认为甲骨文里“去”的字形是从大从口，本义是“口喏而不合”，引申为“离开”。至于从大从口的“去”只有个别书如《甲骨文编》收录，且仅有个别字，这也许是当时的刻工少刻了一笔或由于时间久长“口”的一横磨损而变成了“凵”。“去”的“藏”义来源于“盖”。到小篆中“去”与“盖”混为一个字形，于是“去”就成了一个字形两个词。张儒的《释亡、𠂔》，认为“亡”是“芒”、“铎”的初文，本义是刀剑的尖端。“𠂔”是“坐”的初文。董

来运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卯字》，认为《甲骨文编》和《金文编》中释为“系”字的古文字实际上是“卯”字。杨逢彬的《浅谈“其”的功能和语气》，通过对甲骨卜辞中“其”的考察，进一步论证了古代汉语中语气词的单功能性，这对于汉语语气词的研究和教学具有启发意义。喻遂生的《纳西东巴文题辞译释三则》，译释了三则新发现的东巴文题辞，为研究东巴文的性质和功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关于简帛研究的如：张显成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说文〉未收之秦汉字》，从1973年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发现有660多个秦汉字是《说文》未收之字，这对汉字史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于字体与书体研究的如：张晓春的《古籀音韵训诂考辨新说》，通过对“繇”和“籀”的语音、语义的考辨分析，认为历史上没有史籀其人，所谓史籀造籀文纯属子虚乌有，不足为信；“古籀”也并非东土与西土文字，古籀乃楚系文字，是简牍帛书文字之类。陆锡兴的《释“扁书”》，认为汉简中屡屡提到的“扁书”，实际上就是偏书，它并非一种字体，而是施行于特殊场合的书写技术，即用偏在一边的笔锋书写，依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偏锋书写。陈淑梅的《从东汉碑隶构件的书体特点看汉字隶变的规律》，通过对东汉碑隶构件的书体的考察，探讨了处于今文字初期阶段的汉字体系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总结了汉字隶变的规律。魏宇文的《毕注所谓〈释名〉今本“俗字”研究》，分析了毕注所谓《释名》今本“俗字”的依据及“俗字”的种种情况，并探讨了毕沅的俗字观。

关于汉字性质、汉字形体、结构与部首研究的如：连登岗的《关于文字性质的再认识》，认为现代语言学把文字当做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站在语言本位的立场所给出的定义，是不正确的；该文从文字本位的立场出发，认为汉字的性质首先是视觉图

形，它决定了汉字具有特殊的物理属性、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汉字不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思维及事象的符号。赵伯义的《汉字形体增益》，归纳了汉字形体增益的类型及其方式。孟华、王乐洋的《汉字结构研究的符号学观点》，将文字的结构形式称为“软件”，将结构形式的物质表现手段称为“硬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合治”的汉字结构观，即将文字结构的硬件和软件二元要素看做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强调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研究其中的一个要素。陈顺芝的《六书与汉字构形》，认为汉字形体构造可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肖惠兰的《汉字部首编纂法源流论证》与陈燕的《论汉字部首的构成》，皆从整体上对汉字部首进行了研究。黎传序的《部首“彳”的解析》，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则从微观上探讨了“彳”所表示的各种意义。

关于训诂与音韵研究的如：日本龙谷大学金子真也的《塔、佛、浮图》，通过对“塔”字的产生、“佛”字的训诂、“浮图（浮屠）”的来源、用法和词义的演变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了佛教对汉语语言文字的影响。台湾省政治大学竺家宁的《佛经中几组复合词的训诂问题》，通过对“交”构成的复合词、“归”构成的复合词、“调”构成的复合词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古汉语佛经当中词素组合成词的状况，以及汉语双音化的发展与佛经的密切关系，为汉语双音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马恒君的《〈周易·系辞传〉字训正误举例》，对《周易·系辞传》朱熹注本中承袭多年的误训予以勘正。黄德宽、郝士宏的《略论同源字及相关问题》，认为同源字的研究应该限定在对汉字孳乳分化的考察范围内，研究同源字首先要涉及字原、原字与分化字的问题。袁健惠的《同源词研究的字形视角》，则把字形作为同源词研究的辅助性视角。孙玉文的《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

语音演变》，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古籍和《说文》中所存在的明母与晓母声转的情况。

关于现代汉字与汉字教学的如：吉常宏的《简化字琐议》，对20世纪50年代制订的简化字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当时制订简化字的时候，其指导思想是前苏联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激进思想，对汉字的缺陷估计过重，从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简化面太宽，字太多；以比较少用的字代替某一常用的字，结果两败俱伤；往往用一个笔画少的同音字取代笔画多的同音字，或用一个新造简体字取代另外几个繁体字。这些简化字都给人带来不便。文章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已形成双轨制，二者都要长期共存下去。我们必须认真地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它们和谐起来。既能为现代人服务，也能为传承古代文化服务。陈涛的《古文误注音字举例》，分析了某些古文误注音字的种种情况。孙中运的《汉字读音讹化寻源》，探寻了“蜡”、“兹”、“缸”三字读音讹化的源头。史瑞芬的《对外汉字教学的思路及方法》、吕永进的《试论现代汉字义项使用率与义项设置原则》和阚景忠的《通假字的教学现状及其对策》等，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二）“说文学”研究

“说文学”研究涉及了《说文》本体研究、说文学研究与说文应用价值研究等方面的内容。从方法上来看，有从整体上、宏观上进行研究的，如：宋均芬的《〈说文解字〉研究刍议》，从宏观上把“说文学”研究的内容概括为本体研究、客体研究和历史研究等三个方面。赵铮的《〈说文〉正篆性质研究评说》，概括了前人关于《说文》正篆性质研究的三种观点，即小篆说、古文说、综合说。认为小篆说与古文说虽有合理之处，但失之偏颇，综合说较符合《说文》的文本实际，亦缺乏深入的探讨，

忽视了许慎在《说文》正篆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文章认为，《说文》正篆系统是许慎对其所收集到的文字资料加以规范整理而形成的，是一个崭新的完全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的文字系统，对这一系统许慎称之为“篆”。有从微观上进行分析的，如：孙中运的《试谈〈说文〉与“六书”》，对《说文》中某些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假借字、形声字、转注字的归类问题提出了异议。有进行专题探讨的，如：舒怀的《〈说文解字〉取资纬书说》，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说文解字》取资纬书的情况。张标的《章太炎〈成均图〉笺注与研究》，阐述了对章太炎先生的《成均图》进行笺注与研究的任务及其意义。张其昀的《六书与汉字造字法管见》，认为汉字实际有五种造字法，即象形、标记、会意、形声和变体。李蓬勃的《假借——借名与借形》，认为许慎关于假借的定义有问题，把借名与借形糅合在一起了。黄巽斋的《论亦声字，兼论形声会意的分野》，探讨了亦声字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认为亦声字可归形声字。黄青的《从〈说文〉犬部字看犬与古代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由犬部字字形的发展和字义变迁，探讨了人类社会由渔猎到农耕的社会发展轨迹。还有顿嵩元的《扬雄〈方言〉及其对〈说文〉的影响》、施正宇、王绍新的《从〈说文〉所收、〈十三经〉未见之字得到的启示》、方敏的《试论〈说文〉声训的解释形式》、郝文华的《论汉字的“双本义”》、宋易麟的《〈说文〉省声的是与非》等，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届研讨会所收到的论文中，尚存某些不足之处。例如：有的论文似乎是不了解或无视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而在做重复性的研究；也有的论文过于创新，然其观点缺乏有力的支撑材料，或观点与材料之间的逻辑性尚待加强，或难以推翻前人之成说，仅仅是成“一家之言”而难以被他人接受（至少现在如此，也许实践会证明其正确）；还有的论文执著地

纠缠着某些老问题。我们知道，在文字学与说文学研究领域，有些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并且越争论越糊涂；有些问题似乎人人都可以提出一套理论或说法，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或说法会被学术界广泛地认同。因此，我们不如把精力放在研究别的问题上，不必再去为这些老问题而“皓首穷经”。

二、文字学研究的发展态势及研讨会的特色

本届研讨会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文字学研究的某些发展态势。一是文字学研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说文》自问世以来就备受瞩目，一千八百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过，甲骨文的研究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前人为我们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往往让后学者难以超越，甚至一不小心就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生“撞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走到尽头了。不少代表发言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学术信息与独到的学术见解，就足以说明文字学研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说得具体一些，就古文字研究而言，文字考释依然是研究的重点，即使是已经被前人考释出来的字，有的也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步深化而有必要重新审视，例如上文所举夏渌的《耄年学“眉寿”，切磋有长进》。就现代汉字研究而言，密切联系文字的运用实际来研究汉字的各种问题，就能够使我们的汉字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交际的功能，例如上文所举吉常宏的《简化字琐议》。就说文学研究而言，新的思路、新的视角与新的方法，往往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研究天地，从而使古老的学科焕发出新的活力，例如香港何添的《〈说文〉声母：口——考析》，认为《说文》形声系统，盖以无声字为声母，从之得声者为声子，子母相生，遂有直接声子、二级声子、三级声子以至六级声子之目。文章以声母“口”为例，系联出从口得声的直接声子有“𠂔”、“𠂔”、“𠂔”等；再

系联出从“冂”得声之字“捐”、“绢”、“涓”等17字，系联出从“韋”得声之字“炜”、“纬”、“伟”等20字，系联出从“员”得声之字“圆”、“陨”、“损”等14字。这种对形声系统所作的分析，既可以探求文字由简而繁、由形而声的演变轨迹，明了文字发展之先后次序，以观其所以得声之故，又可以揭示义寄乎声之原理，以观其孳乳之方所以得义之故。

二是注重领域的拓展与应用性研究。例如古敬恒的《〈郭店楚简〉异体字探析》，对《郭店楚简》中的异体字进行了分类，并且探讨了异体字的特点，同时就某些异体字的释读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这就为人们正确释读和深入理解楚简文字提供了一片钥匙。祝鸿熹的《〈说文〉解读与辞书释义》，分析了《说文》释义的种种复杂的情况，指出了语文性辞书在单字释义时引用《说文》所出现的常见错误。这对于人们正确地利用《说文》有着重要的意义。台湾省《中文》杂志总主编戚桐欣的《中文电脑化的基础工程是研究〈说文〉》，揭示了《说文解字》在信息时代、电脑化时代的价值，拓展了《说文》研究的领域。这些都表明文字学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它应该也完全能够走向社会，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三是注重学理的研究。传统小学研究往往重材料而轻理论。如何对传统小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学理的清理与阐释，就成了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向光忠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形音义学说》，运用现代语言文字学的科学理论，对传统语言文字学如“形训说的理论基础、根本旨趣、应用效能、拘执流弊”、“声训说的名物观念、音义关系、适用范围、附会臆说”、“义训说的语义依据、主要方式、实际效用、固有缺陷”、“谐声说的谐声偏旁含义（右文说）的客观成因、合理成分、以偏概全与失之穿凿之弊”、“通转说的音理分析、变易规律、佐证材料、掌握限度”等的演进状况，作了溯源探流的梳理，并且阐

释其要义、廓清其混乱、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无疑具有现实的学术意义。

四是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有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采取系统贯通的方法来从事文字学研究。例如：

近年来，有好些文章提到几个从“兔”得声的字应该读“逸”、“绎”、“奕”。其根据一是文物和文献资料，二是“喻四古音归定”的学说，但一般避开了韵部问题，因此只能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张振林的《也谈兔字和几个从兔之字》，从构拟语音缓读及其裂变和急读合成模式着手，寻绎“兔”和“由”之古音与其裂变音的关系，从而说明从“兔”得声之字可读“逸”，从“由”得声之字可读“迪”、“胄”的道理。并且运用该音变模式，还解释了许多同声偏旁而不同读的问题。

我们知道，《说文》是通过小篆形体的分析来说解造字的本义的，然而《说文》中对某些字的说解并不是探求其本义，而是运用阴阳五行学来说解字义。现代研究《说文》的学者基本上对此持否定态度。人们在谈及《说文》的缺点时，往往以此作为佐证材料，认为这是在宣扬阴阳五行学说而应予以批判。黎千驹的《用系统论来重新审视〈说文〉中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系统论的观点，采取文史哲与《说文》系统贯通的方法，结合中国传统哲学、许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说文》的说解体例，综合分析了《说文》中运用阴阳五行学来说解字义的现象，认为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不能对此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其理由是：第一，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阴阳五行学说是先民的一种世界观。阴阳学说蕴涵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五行学说蕴涵着朴素的唯物论成分。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整个古代文化，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如果没有阴阳五行学说，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未必会如此灿

烂。既然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许慎在《说文》中运用阴阳五行学来说解某些字的意义未必就是一个绝对的错误，至少，它由此而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反映了古人的一种思想律——阴阳五行学说，并且也包含了这种传统文化与思想律的合理内核。第二，从许慎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汉代阴阳五行昌盛，尽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儒学在中国此后的两千年历史长河中一直居于学术思想的主流地位，然而此时的“儒术”已经不是纯粹的儒术了，它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法家的某些思想，或者说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由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了整个汉代的官方哲学，它渗透在两汉的政治、思想、文化之中。许慎处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来编撰《说文》，因此《说文》中宣扬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势在必然与情理之中了。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先秦与汉代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文化习俗等。由此观之，也不应对《说文》中宣扬阴阳五行学说进行全盘否定。第三，从《说文》说解的体例来看，该文发现了《说文》中还暗藏着这样一种说解体例，即以某一意义为核心，通过对一系列相关字的说解来建构（或者贮存）先秦“六艺群书”的词义系统。这样就形成了《说文》中“隐性”的说解体例，同时也使得《说文》中的词义同样具有系统性。于是，根据《说文》中这一词义系统去理解六艺群书中相关的词语，便可迎刃而解了。

本届研讨会具有鲜明的特色，即慎思与创新，群贤各抒己见；平等与民主，君子和而不同。从论文质量来看，上至八十高龄的夏赓先生与孙中运先生，下至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代表们对自己所撰写的论文是在经过了长期积累、慎重思考之后而完成的，绝大多数论文持之有故，言必有据。有不少论文把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相结合，视角独特、方法独

到、考证精当、分析透彻。因此在宣读论文时，各人几乎都是胸有成竹，侃侃而谈。但是，我们知道，科学是求真，是逻辑的、实证的、一元的。人们都在努力地求真，然而究竟谁求得了这惟一的“真”，还得接受实践的检验；对于“真”的探求也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感性到理性的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认识过程。正因为如此，有了研究，于是也就有了讨论，也就有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有“研”有“讨”，方不失“研讨会”的真谛。然而如何“研讨”？这就体现着研讨会的特色。

代表们认为，我们的“研讨”，既不应是盛气凌人、群起而攻之，也不应是阿谀奉承、同声而颂之，而应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什么是“和”？什么是“同”？简言之，“和”是众多元素经过化合的统一物，“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同”是同一，是“以同裨同”（《国语·郑语》），即相同元素的简单相加。“和”是和谐，“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国语·郑语》）“和”能生万物，具有创造性，“同”则单一而无发展。“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代表们高兴地看到，道之不明，则论争生焉。论争的双方，无贵无贱，一律平等；无长无少，皆有民主。论争的目的，并不是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希冀得出惟一的结论，但代表们从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感受到自己的大脑里已迸射出了智慧的火花，大家都为自己的论文能够得到同行的指点而庆幸，都非常感谢诤友的良好。于是，会议期间经常出现这种场面：会上大家相互质疑困难，针锋相对；会下大家握手言欢，合影留念。

代表们高兴地看到，已达耄耋之年的前辈专家学者如夏渌、孙中运、吉常宏、向光忠、祝鸿熹、黄巽斋诸位先生，以及张振

林、竺家宁、陈涛等先生，他们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会议、以和蔼的态度倾听代表的发言、以谦恭的精神回答代表的提问。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丝毫的名人派头，而只有长者的风范。

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科学精神的会议，一个其乐融融的会议。而这一切又是与会议的发起人与主持者向光忠先生分不开的。代表们非常感谢已届古稀之年的向先生以其敬业精神、长者风范与人格魅力为会议营造了这样一个宽松和谐而充满温馨的气氛；同时也非常感谢舒怀先生，是他率领湖北大学的几位学者为大会的会务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而使大会得以顺利召开并圆满结束。

（作者黎千驹，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